



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张造群 李宗桂

摘要: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依托和归宿,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和重构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能长期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的依据。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各种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矛盾、化解危机方面提供借鉴和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其对于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自强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2-0005-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里,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还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筑民族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依托和归宿。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和重构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

(一)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意义

“认同”原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根据主体、范围和内容的差异,认同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如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其中,文化认同关系到个体或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确定自身身份的特殊尺度。文化认同是最重要最深层的认同。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一种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也会带来文化认同的某些变化,或是对外来文化的强力排拒和对自身文

收稿日期:2022-11-14

作者简介:张造群,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5),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宗桂,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古代哲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化的强化保护,或是受外来文化先进性、合理性的影响和感召而产生新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伴随着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异质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进而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的。远古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并不突出,文化认同意识也不强烈。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们才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关注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领土疆域,形成了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这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一系列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合理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在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与民族文化认同密切相关的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问题,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势必会动摇民族的精神价值系统,导致人们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空虚。精神家园是指特定社会(民族)中的个体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民族)自身对社会、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种精神认同,这种认同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稳定的心理框架和积极的行为导向,一套积极的价值观念和合理的道德规范。在文化中构筑精神家园的功能在于为个体提供精神的皈依,为精神世界建立起秩序,赋予个体以意义^①。精神家园“虽然是无形的,却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所在。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精神家园,人们将会失去归属感,并导致价值判断的混乱,丧失民族的凝聚力,丧失文化创造的生命力,最终会影响社会的秩序,进一步会影响社会正义的实现”^[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保持文化主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坚持民族文化认同与保持文化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文化交融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形态。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已成为我们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增强

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妄自尊大,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这就需要防止过与不及两种极端。在这方面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汲取。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不仅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直接相关,而且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信有关。“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3]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4]这既是华夏民族自信的源泉,也是华夏民族深得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仰慕的原因。古人所谓“夷夏之别”包含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孟子说“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5]。在世界历史上,民族同化有两种:自然同化与强制同化。在中国是自然同化,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特性和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拥有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具有天生的优越感^[6]。而这种态度中蕴藏的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能长期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民族文化认同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妄自尊大乃至固步自封,这对本民族的发展同样是不利的。历史证明,盲目的自信自大曾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

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上,还有时代背景的因素需要注意。“历史告诉我们,同是这个传统文化,不同的境遇会导致对她有不同的态度:国家积弱产生文化迷茫,民族自强则产生文化自信。”^[7]今天我们坚持民族文化认同,既不要自我中心主义,也拒绝民族虚无主义,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有人民性、科学性、民主性的内容,抛弃那些反人民、反科学、反民主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具有超时空的现实意义,并能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后人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实践表明,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很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坚持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如果缺乏历史传承及民族心理依托,时代性与民族

性就可能脱节,再好的社会制度如果不与民族传统相融合,如果不被民族心理接受,则很难取得成功。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理论思考和生动的社会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历史传承性,如果否定传统、割断历史,民族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无从安置。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建设精神家园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接续发展的过程,都需要在传承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精神家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文化自信自强的增进、民族精神的培育、青年价值观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等。从主体角度看,精神家园的建设具有历史继承性,它一般是以自我为中心并通过文化认同的路径实现的。因此,构建精神家园的主体必须要对本民族的精神有清晰的认知,“对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有自觉清醒的反思能力,才能根据文化环境的新变化作出正确的取舍,找回和确认民族文化主体的精神支柱,从而凝聚民族精神”^[8]。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指出,制度革新虽然重要,文化根基却更重要,那些古老的信条与新的历史要求相融合,保证了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使价值观得以延续,使人的存在有归属感,这也涉及精神家园的问题。对于个体而言,精神家园是其精神世界与心灵的归宿,是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与追寻;对于民族而言,精神家园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宿。建构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是接受共同的文化传统,因为精神家园通常寄托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就表现出崇

尚理性、关怀社会的特质,诸子百家以“救世”的使命感思考社会问题,展开自由论辩与争鸣,并由此形成了独立的精英文化,中华民族精神也得到自发而充分的展现。孔子通过对“天下无道”“国灭世绝”的社会批判提出了“克己复礼”和“为政以德”的主张;老子通过对“厌民之生”“惧民以死”的社会批判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主张;墨子通过对“别相恶”“交相贼”的社会批判提出“兼爱”“贵义”的主张;孟子通过对“独夫民贼”“杀人盈城”的社会批判提出“民贵君轻”“王道”“仁政”的主张;庄子通过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社会批判而提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的主张。总之,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包括道家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自由精神,儒家的仁爱精神、正义精神、中和精神,墨家的博爱精神、平等精神、务实精神,法家的进取精神、变革精神、法治精神等。即使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千百年来这些理性精神仍在传承赓续,共同营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③。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外来文化要实现与本土文化的成功结合,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能够促进其生长发育的土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佛教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实现中国化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发展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说明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内在的契合。也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土壤与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桥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基础。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近现代革命先驱

通过艰难卓绝的斗争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文化心理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者存在共同点和契合点。张岱年曾经认为:“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唯物论与辩证法方面,存在相通之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及其构成要素都具有客观的物质性。中华传统文化对“气”的理解也包含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老子敏锐地看到对立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一面,既看到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重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0]80}的一面,又看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一面,“反者道之动”^{[10]226},“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0]284}。《易传》则用“阴阳”这对概念范畴来表示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一阴一阳之谓道”^{[11]538};事物的发展是“变动不居”^{[11]596}的,“生生之谓易”^{[11]538},“刚柔相推而生变化”^{[11]531},并通过对辩证法的把握提出“物极必反”和“否极泰来”的论断。

中国古代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的依据。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维度,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2]1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与自觉的活动。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185}。中国古代也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尚书》曰:“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孝经》引孔子语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他思想家也有关于爱民、重民的思想。《管子·霸言》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人的“人本”更多地体现

为“民本”,是从如何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说的。受时代的局限,虽然古人的“人本”并未包含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个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等意蕴,但它包含了由“民本”发展为“民主”的文化基因,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准备了条件。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理想社会图景,体现着对“天下为公”的求索,包含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如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同样发挥着批判现实与建构理想的功能。在“大同”理想的激励下,历代有识之士以“均平”思想为号召展开了对社会“不平”的批判^④。如清初唐甄《潜书·大命》中通过对不平的批判导出了人权平等的观念:“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13]近代以来,学者们也把传统的“均平”思想与外来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由于“大同”理想孕育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胚芽,近代以来人们大都以“大同”概括和解读社会主义思想。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价值内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既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典范,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从国家层面来看,所谓“富强”“民主”就是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展民生,唯有人民生活富足安乐,国家才能富强昌盛。这些思想可以从古代找到根源。《管子·治国》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4]924}之说,儒家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5]127}之论。《周易·益·彖传》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11]344}意即减于上而增于下,民众会喜悦无限;从上方施利于下,其道必大放光芒。

富民思想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177}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稳定安宁。尽管古代“民本”思想还不等于现代民主思想，但它包含着“立君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吕氏春秋·贵公》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凡主之立也，生于公。”^[17]《荀子·大略》强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8]

中国古人也赞扬“文明”之世，把“文明”视为一种理想社会的理想政治。《尚书·舜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16]51}在这里“文明”指圣贤在位而天下清明。汉代焦延寿《焦氏易林·节之颐》曰：“文明之世，销锋铸耜。”南朝鲍照《河清颂》曰：“大人在上，区宇文明。”前蜀杜光庭《贺黄云表》则称：“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从这些均可看出古代“文明”一词与现代颇有相似之处。

“文明”之世必然要求社会和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社会和谐的倡导与追求。“和谐”一词古已有之，它原指乐律的调和，后来又被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西周史伯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9]《中庸》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0]18}中和既是天地位、万物育的自然法则，也是人伦关系的社会法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0]38}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即在与人交往时既能与之保持和谐友善关系，又能坚守必要的原则。整个制度设计也贯穿和谐的理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5]8}这种理念要求人们在与他人相处时应“求同存异”，社会规范以和为贵，人与人、人与自然要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道家庄子崇尚精神自由，而明确主张社会“平等”的主要是墨子，他反对“亲亲”“尊尊”的等级秩序，并以上天的名义提出“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21]77}，还指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21]29}。虽说庄子式的精神自由和墨子式的天赋平等均缺乏必要

的社会制度支持，但都体现了古代思想精英的理性思考。“公正”与“法治”在古代亦有悠久传统。古人从天道中解读出“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14]1178}的自然理性，而天道之“公平”是人道之“公正”效法的依据，因此古人把“公”看作国家权力的来源和依据。《慎子·威德》明确指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22]16}慎子还看到，“天下之公”需通过制定法律与完善度量设施才能转化为现实，“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22]18}。《慎子·逸文》又曰：“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22]108}由于法被看作“至公”之制，它应该用来统一天下的认识与行动，这就是“法治”。故慎子又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22]102}《文子·上义》则进一步指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23]可见在文子看来法的现实依据就是“人心”。商鞅提出“缘法而治”的“三不”原则：“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24]法成为衡量一切是非的准绳。故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25]38}

自古以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屈原的爱国精神一直被后世所景仰；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指出：“烈士之爱国也如家。”^[26]曾巩《和酬赵官保致政言怀》云：“爱国忧民有古风。”说明爱国一直都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基因。陆游感叹：“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文天祥长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明爱国之志；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敬业乐群”的传统美德。《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主张“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马融《忠经》言：“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知，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君子尽其忠能，而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闻也”。

诚信与友善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对国家来说,即使去兵、去食,统治者也必须取信于民,因为“民无信不立”;对个人来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5]21}。在“友善”方面,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123}。孟子认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5]119}亦言:“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5]83}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从理论上来说,文化具有民族性,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同时还具有抽象性和跨越时代的属性,这些特点使文化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从本民族的传统出发,否则现代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许多珍贵的思想文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对于当下国家和社会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要而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体现了显著的民族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成果、获得新发展的最好例证^⑥。只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一定能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矛盾、化解危机方面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也引起和加深了西方文化的深层危机。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的文化矛盾而处于文化危机之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

由于资本主义盛行的价值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其二,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以官僚化、阶层性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个人重复着高度机械化、单一化和专门化的工作。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失去了可以团结人们的统一精神,很难再追求崇高理想与信念。在这两种文化矛盾中,资本主义已失去它传统的合法性(即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信仰),人们对艰苦工作已失去了过去的虔敬,转而信奉及时行乐与物质主义信条,而资本主义商业与市场体系推动了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盛行。人类面临着科技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所产生的许多负面问题。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需要接受文化的多元化,以更加尊重、包容的方式和平相处、建立对话以求共同发展。以开放的、创造性的、理性的心态对待传统,在传承前人的智慧与创造的文化的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因此,在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面前,急需中华传统美德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广泛参与。

如果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获得的认可程度看,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赞赏—批评—再发现”的过程。众所周知,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一度成为欧洲人赞美与向往的国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和对外扩张,中华文化失去了原有魅力,并受到质疑与批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社会各种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日趋激化,相继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知识界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哀叹。1920年梁启超回国,发表《游欧心影录》,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个人方面导致个人主义与金钱崇拜,在国家方面则导致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造成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科学破产。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目光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探寻中华文化蕴藏的传统价值观念。此后,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逐渐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并获得了认同。而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源于其对西方现代化结果的反思,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新的认知与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过往的历史

文化,又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现实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注重生命的存在、个人的德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主张“身心合一”,认为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关系,而达到“身心合一”就要靠“修身”。修身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闻道反己,修身者也。”^[27]¹⁰⁴《大学》载:“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载:“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20]²⁸修养是以是否符合“道”为标准,推动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就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修身近至仁。”^[27]¹⁰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对“道”的维护,考虑的是精神的自我满足而不是外界的毁誉。《韩非子·难一》对“仁义”解释为:“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25]³⁵⁶所以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11]⁵⁸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我合一”观念,为解决各类发展问题与社会矛盾提供思想资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个人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伦理关系的核心。“人我合一”是说在“他人”和“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融洽的关系。《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0]²⁸“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亲亲”虽然是最根本的,但可以扩大到“仁民”,孔子将“仁”当作修身、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仁”的主要含义包括“克己复礼为仁”,即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郭店楚简·五行》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27]⁸²汉代董仲舒指出爱人为仁,正我为义:“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8]如果一个人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他人,把“爱人”与“正我”结合在一起,注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德修养,则可以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

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要担负起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崇高使命。这种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主张,与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是一致的^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中贵和”理念,为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关系、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有益资源。“尚中贵和”是处理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解决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则。同时,贵和思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看法与人类生存之世界休戚相关。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坚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我们在研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

注释

- ①参见严春友:《“精神家园”综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②参见欧阳康:《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如何构建》,《光明日报》2013年8月1日。③参见李宗桂:《“阐旧邦以辅新命”——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滋养》,《人民日报》2014年5月19日。④参见李宗桂:《从“调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⑤参见李宗桂:《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日报》2005年2月4日。⑥参见李宗桂:《生态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哲学动态》201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2]严春友,朱红文.简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0.
[3]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
[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87.

-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5.
- [6]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81-182.
- [7]王四达,董成雄.从“文以载道”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凝练与体系开展[J].哲学研究,2016(3):118.
- [8]李宗桂,等.中华民族精神概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18.
- [9]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0.
- [10]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唐甄.潜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5:97.
- [14]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6]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7]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
- [18]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72.
- [19]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470.
-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1]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2]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3]王利器.文子疏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476.
- [24]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
- [2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38.
- [26]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7:378.
- [27]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28]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562.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ng Zaoqun and Li Zonggui

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 nation to survive and develop, and the spiritual homeland is what national culture relies on and where returns to for getting nourishment, so overcom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crisis and rebuilding the spiritual homelan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people's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ir adhering to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and made the Chinese nation standing among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has a profound humanistic tradi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Marxism can take root in China. In modern societ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help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and crises faced by human beings in their living and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tained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thus create a new brilliance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

[责任编辑/周舟]